

试论甘孜藏区民众对红军长征的历史贡献*¹

周正龙 马正辉

【摘要】：80多年前，红1、2、4方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先后进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红军的民族政策和模范行为赢得了藏区民众的尊重和拥护。为帮助红军长征，藏区民众倾其所有，支援各种急需物资；当翻译、做向导，带领红军北上；踊跃参加红军，壮大革命力量；配合红军作战，保卫藏区各级红色政权；照料和保护红军伤病员，保存革命火种。“藏区人民在红军长征期间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

【关键词】：甘孜藏区；民众；红军长征；贡献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7）06-0154-8

80多年前，为了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和实现“北上抗日”的愿望，中国工农红军1、2、4方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先后挺进到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简称甘孜藏区或甘孜）。在这里，红军承认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等民族与宗教政策，帮助藏族地方建立省、县级波巴（或博巴，为藏语音译，意指藏族或藏人）地方自治政府，成立波巴革命党、波巴青年团等革命青年政治组织，组建波巴自卫军、丹巴藏民独立师等地方革命武装，并在康北藏区推行土地革命……。红军在藏区的民族政策和模范行为，赢得了各族人民的尊重和拥护。藏区各族民众为帮助红军长征，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做出了巨大贡献。值此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之际，笔者以此题来重现和纪念甘孜各族民众对红军长征做出的贡献，以飨广大读者。

一、红军在藏区的民族与宗教政策和模范行为

红军在进入藏区之前，由于历届中央政府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藏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民族关系较为紧张。“这里的藏人部落女酋长对任何汉人，不论红白，都怀着不共戴天的宿仇，她威胁说谁要帮助这些过路人，就活煮了谁”^[1]。长征时期，在藏汉民族本已存在嫌隙心理的情况下，国民党还制造种种谣言，诬蔑红军，“红军要把青年妇女抢走，壮年男子抢去支差，小孩子抢去喂马”，“要把大人杀来吃，把小孩拿来抛刀尖”^[2]等等。红军刚进入藏区时，很多群众为了“避难”，纷纷逃入深山老林中，甚至被要求不准卖粮食给红军，不准给红军带路、当通司（翻译），在此不利形势下，如何解除藏民对红军的误解，赢得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成为摆在广大红军指战员面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红军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实施统一战线策略，赢得了藏区民众的普遍尊重和拥护。

（一）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

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政策是中共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立场和根本政策，也是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之一。

在进入藏区之前，红军已经通过各种形式如标语、歌谣和漫画等来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如“番、汉人民是一家”“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治、解放弱小民族的！”“实现各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等^[3]，要求大家从思想上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进入藏区后，红军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红1方面军进到四川彝、藏地区时，发出告示：“中

¹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康巴民族文化史”（项目编号：11YJA850012）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周正龙，四川民族学院副教授，四川 康定 626001；马正辉，四川师范大学教师，四川 成都 610066。

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尊重夷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4]

不仅如此，红军领导干部还带头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红2方面军进入藏区时，贺龙同志对没有逃走的藏族同胞亲切地讲：“红军是为穷苦老百姓来的，不要怕。你们去把上山的人都叫回来。我们不打人，不骂人。你们的東西，希望拿出来卖，我们不少给钱，愿卖才卖，不愿卖不强迫。”^[5]贺龙同志不仅这样说，而且也是如此行动。夏拿古瓦通司找了3位喇嘛，给贺龙送来2驮茶、2驮米、2驮猪肉、2驮糖、1驮盐。贺龙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白得别人的东西，于是拿出笔记本，把所有的东西都登记下来，照价付了款。”^[6]贺龙同志带头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模范行动，给红2、6军团红军战士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红军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及模范行动，使饱受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的各少数民族深受感动。他们把党和红军看作是自己人，民族成见和隔阂在逐渐消除，进一步促成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二）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中国是一个有着多种宗教的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尊重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也就是尊重这些少数民族。

红军在进入藏区初期就形成了对藏区宗教政策的总原则。1935年6月，红1方面军到达四川懋功^①，立即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明确宣告：“政教分立，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7]。1936年5月，党在给康藏民众的宣言中称：“宗教与政治必须分离……宗教不得干涉政治。”^[8]

在对藏区宗教政策的总原则指导下，红军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有的藏胞在门上挂着红布条，贴着封门“神符”，红军指战员一致遵守纪律，不动“神符”，不进家门，露宿在门外冰天雪地里，并把他们的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9]据已故藏学学者任乃强先生记载，红军“所至保护寺院，尊重习俗，爱惜人命，避免摩擦”^[10]。1936年春季，朱德同志率红军抵达炉霍。当地百姓因为匆忙“避难”而把牛羊等财产留在了家里。为避免百姓财产受到损害，朱德同志颁布了四条纪律：即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爱护藏胞的一草一木；在藏胞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屋；看管并喂好藏胞留在家中的牛羊。^[11]战士们严格执行朱德同志的四条规定，做到了秋毫无犯，赢得了藏族人民的普遍拥护和支持。

（三）实施统一战线策略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它是由新民主主义时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所决定的。实施统一战线策略，争取团结民族与宗教上层人士是中共一贯的政治主张。长征期间，鉴于绝大多数民族宗教人士在反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方面“显然还带有革命的作用”^[12]，红军决定改变政策和策略，团结他们并引导和帮助其进步。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的决议中指出：“估计到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程度与经济条件的条件，我们不能到处把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在有些民族中，在斗争开始的阶段上，除少数上层份子外，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13]

在统一战线策略的指导之下，红军不仅在甘孜藏区团结了一大批象格达活佛、夏克刀登、邦达多吉等民族上层人士参加革命斗争，而且挑选一部分优良的番民给以阶级与民族的教育培养，并在各级格勒得沙政府和波巴政府中大量使用民族干部。^[14]因此，促使扎喜旺徐、赤绒恩召和王寿才等一大批年轻的藏族同胞迅速成长起来，为民族解放和民族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

红军的民族政策和严明的纪律，对寺庙僧众的尊重，对百姓的帮助，在甘孜藏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枪不响、鸡不鸣、狗不叫、麻雀也安宁”^[15]的顺口溜至今还广为流传。藏区民众把红军看成了“自己人”，把红军说成是“菩萨兵”。他们逐步

与红军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据 1936 年出版的《康藏前锋》杂志记载：“3 月 25 日至 29 日，朱倭喇嘛寺投匪，……甘孜喇嘛寺亦投匪。”^[16]因此，红军的长征得到了包括民族上层在内的广大藏区民众的支持。

二、广大民众对红军长征的支持

（一）倾其所有，支援各种急需物资

中国自古就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之说法。粮物对于部队行军作战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对整个战争的胜利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甘孜藏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南，地域辽阔，人口稀少，因土地贫瘠，粮食和物资十分匮乏^[17]。在 20 世纪 30 年代，粮食（青稞、玉米一类的作物）亩产在 100 斤左右，总产量仅够当地农牧民维持最低消费。^[18]再加上 1935 年前后，“灾荒频仍”^[19]，粮食产量更是剧降。不仅如此，这里气温低、温差大^①。恶劣的自然环境，对来自南方、衣着单薄的红军指战员而言，如何御寒是一件头等大事。长征期间，红 1、2、4 方面军有十多人先后到达这里，前后停留近十七个月，足迹遍布十六个县，十多万人的衣食问题显得尤为困难。“康区本系缺粮之区，骤然增加十余万人，时半年之久”^[20]，粮食牲畜几尽。尽管红军在此期间，通过打土豪、缴获战利品的方式获得了一些粮食；也通过购买的方式筹集粮食，但是仍不能满足需求。为了解决红军面临的极大困难，甘孜各级自治政府发动群众开展拥军活动。广大民众宁肯忍饥挨冻，也要把衣粮送给红军，他们尽最大努力，将这片土地打造成为红军长征途中重要的物资补给站。

1. 各级自治政府对红军的援助

红 4 方面军南下后，格勒得沙共和国各级自治政府成立了粮食委员会，专门负责为红军筹集各种物资。丹巴县格勒得沙政府，曾协助红 5 军筹集粮食 50 万斤，食盐 4 千多斤，还有大批油、肉等物资。^[21]

波巴政府把救援红军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支援红军粮食，道孚波巴依得瓦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条例中明确规定：“为要解决群众和红军的目前急需，应采取以下办法：1. 由群众共同商议，依照存粮多少，筹出一部分粮食出来，平价卖给无粮群众和红军食用。2. 现在正是打康定的时候，凡我波巴群众都应一律赞助。决定本特区借给红军战粮三千石。有粮的多出，无粮的少出。”^[22]在政府工作人员的大力宣传下，群众筹粮热情高涨，仅道孚县波巴政府为红军筹集的粮食就有 3 千多石。^[23]

据测算，在康北地区红军需要粮食约 9 0 万斤，人均需供粮大概 90 到 100 斤左右。其中绝大部分是波巴政府筹集的，各级波巴政府为红军长征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24]

2. 民族上层人士对红军的支援

红军进入甘孜后，提出了“兴番灭蒋”民族解放口号，实行了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从而赢得了大部分民族上层的拥护和支援。这些民族上层，除自治政府成员外，还包括寺院僧侣和土司头人，他们掌握了藏区主要粮食和牛羊，对红军的支援贡献最大。

波巴政府成员在支援红军上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波巴政府领导人白利喇嘛寺格达活佛发动仅有 100 名喇嘛倾其寺庙所有，交献的“拥护红军粮”计有青稞 3 万余斤、豌豆 4 千多斤^[25]，并支援军马 15 匹，牦牛 19 头；军事部长藏族大头人夏克刀登，一次就从德格运来 150 头牛、53 匹马、50 驮粮食，红军以银元、枪械回赠，作为酬谢^[26]；在瞻化（今新龙县），博巴政府主席巴登多吉除了将自己的粮食牲畜支援红军外，还派人到麻日乡和白玉县昌台区为红军筹粮，购买牲畜。

在甘孜县，除白利寺对红军的支援外，甘孜寺委派喇嘛洛绒牛拥、土登郎加负责向下属的 7 个喇嘛寺征集青稞 7746 斗、豌豆 5305 斗，共计 195760 余斤交给红军；更龙寺支援红军粮食 50 多石，约 1 万余斤。绒坝岔头人拿瓦家族支援粮食 10 万斤，

阿都土司 5 千斤，古龙和仁青多吉家 1 万斤，日普家族 8 千斤。红军在炉霍县期间，得到以觉日寺扎日活佛为首的僧俗民众的积极援助，仅寺庙就捐 2 百万斤粮，1 万头牲畜，还捐赠了大经堂中供 5、6 百人坐的藏毡。仁达长沙寨子的头人益西绒布主动将自己的 3 万斤粮食支援红军。在新龙县，色威乡俄日寺为红军筹粮 3 百袋，约 24000 斤。喇嘛充翁然登还把自己的一匹马送给红军。

康南各喇嘛寺，主要为途经当地的红 2、6 军团筹集粮食。1935 年 5 月中旬，红 2 军团从中甸抵达德荣县（即得荣）。为了解决红军缺粮的严重问题，当地最大的龙绒喇嘛寺决定赠送红军 1.5 万斤青稞，并派人到农村动员群众出售 4.6 万多斤粮食以及大量肉类和酥油。^[27]巴塘县波寺支援红军粮食 1 万 2 千 5 百多斤，酥油 2 百多斤，牛羊 1 百多头，亚日贡竹瓦喇嘛寺先后两次支援红军粮食 6 万 2 千多斤。红 2 军团到白玉县，白玉寺送给贺龙 3 匹马和一批粮食物资，嘎拖寺支援红军 1 万 3 千多斤粮食和 6 百斤酥油。

红 6 军团到达乡城县，桑披寺号召四乡群众筹粮到桑披寺支援红军。到达稻城县，雄登寺支援红军 200 多驮粮食，50 多头牦牛和部分酥油。在理塘县，青春科尔寺送给红军大量的青稞、酥油、牛羊和碗碗糖，据当时为红军背运物资的阿昂回忆仅碗碗糖就有 1 千多斤。

红军甘孜会师北上途经色达县，由于秋毫无犯，色达最大的洞嘎喇嘛寺堪布班马多吉在红军离开时，将寺内大部分粮食和物资支援了红军。^[28]

3. 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支援

藏区民众把红军比做“菩萨军”，把红军当作亲人，踊跃支援红军粮物。

丹巴县百姓为供应和筹集红军的粮食，几乎全民动员。巴底乡藏民格达一先把家中仅有的玉米膜和留作种子用的 3 斤“二季豆”煮熟了送给红军，又请人用自家的麻为红军编了 15 双草鞋。^[29]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 10 个月中，丹巴各族人民先后筹集粮食 20 0 余万斤；牛、羊、猪万余头（只）；马千余匹；肉、油万余斤；毡子千余匹，还有帐篷、藏装、皮毛、鞋等物资若干；仅是 1935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 月的头 3 个月就为红军筹集粮 34 万斤。这对于当时只有 3 万人口的丹巴来说难度是可想而知。^[30]康定县采取一打（打土豪、劣绅）二借（向有粮户借）三换（用银元或大烟交换）四没收（没收国民党军队溃退后留下的粮食）的办法，在角坝、金汤、麦崩、高梧、塔公等地据不完全统计共筹集粮食 274 8 石（以每石折合 200 公斤计算），折合 5149600 公斤；牛、羊、猪等牲畜 1146 头（只）；还有酥油、牛肉、皮毛、柴草、蔬菜等物资，更不计其数。

丹巴县百姓为供应和筹集红军的粮食，几乎全民动员。巴底乡藏民格达一先把家中仅有的玉米膜和留作种子用的 3 斤“二季豆”煮熟了送给红军，又请人用自家的麻为红军编了 15 双草鞋。^[29]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 10 个月中，丹巴各族人民先后筹集粮食 20 0 余万斤；牛、羊、猪万余头（只）；马千余匹；肉、油万余斤；毡子千余匹，还有帐篷、藏装、皮毛、鞋等物资若干；仅是 1935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 月的头 3 个月就为红军筹集粮 34 万斤。这对于当时只有 3 万人口的丹巴来说难度是可想而知。^[30]康定县采取一打（打土豪、劣绅）二借（向有粮户借）三换（用银元或大烟交换）四没收（没收国民党军队溃退后留下的粮食）的办法，在角坝、金汤、麦崩、高梧、塔公等地据不完全统计共筹集粮食 274 8 石（以每石折合 200 公斤计算），折合 5149600 公斤；牛、羊、猪等牲畜 1146 头（只）；还有酥油、牛肉、皮毛、柴草、蔬菜等物资，更不计其数。

道孚县泰宁八美区群众了解到康定金刚寺在拍桑村存有大量粮食后，就由泰宁波巴独立军派人与红军一道去运回了 200 多驮粮食；瓦日孟拖的群众带领红军找到了 2500 余斤地主窖藏的粮食。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道孚期间，道孚人民支援红军粮食约 4 百万斤。红军在炉霍县休整期间，“全县总共为红军筹集粮食约 5 百万余斤，各类牲畜约 4 万头，柴草数千万斤”，食盐 5 万公斤，酥油 1 千多公斤和大量的羊毛、衣被及帐篷、鞍垫等；还筹集了 1 万多块藏区通行货币——藏洋；朱倭一个名叫马交切绕的藏民把家里储存起来准备为年迈的父母办丧事的粮食，全部献给了红军；雅德、泥巴、宜木、斯木的群众，一次就

支援红军粮食 4 百万余斤。甘孜县的贫苦群众把仅有的一袋、半袋粮食拿出来支援红军，仅绒巴岔的群众就支援红军粮食 660 袋，合 52800 斤；生康乡的群众支援红军粮食 2 万多斤。新龙县群众积极支援红军。该县河西乡支援粮食 3 百多斤，牦牛 15 头；沙堆乡支援粮食 6 千多斤，牛羊毛 6 千多斤，牦牛 1 百多头；乐安乡支援粮食 5 千余斤；阿色乡牛场支援牦牛 1 千多头。共计粮食 11300 斤，牛羊毛 6 千多斤，牦牛 2 千多头。

红 2、6 军团经过康南地区时，人民群众也做了大量的支援。红 2 军团在乡城县休整的 7 天中，各乡群众把青稞、荞子、大麦、小麦和麦面等粮食运送到桑披喇嘛寺，“堆得象小山一样”^[31]。巴塘县村民阿称一家，一次就支援红二军团粮食 2700 多斤，牦牛 27 头和 2 匹马。红 6 军团从稻城到理塘的路上，许多藏民手捧哈达，带着糌粑酥油、牛羊欢迎红军^[32]。

色达县是红军会师北上最后离开甘孜藏区的地方，红军从色达群众手里筹集到了 4 百多头牛、1 千多只羊和部分粮食。

总之，红军在甘孜藏区行军途中多数情况下还是处于筹粮筹物艰难的境地，由于得到了藏区民众的大力支持，保证了红军军需供给，红军顺利地完成了北上任务。

（二）当翻译、做向导，带领红军北上

红军长征到甘孜后，除衣食问题之外，还遭遇两大困难：一是交通不便，甘孜藏区“关山险阻，羊肠百转”，“地险路狭，马不能行”^[33]，极不利于行军作战；二是语言不通和缺乏对藏区民族、宗教习俗的了解。因此迫切需要一批既能懂藏区各民族语言，又熟悉本地自然、社会、经济及交通等等情况的翻译、向导。许多藏族同胞积极主动为红军当翻译，做向导，帮助他们克服各种艰难，顺利完成北上任务。

1. 当通司，沟通民族语言

“通司”即翻译，是指能懂汉、藏双语的人。红军对“通司”十分重视，“要优待通司，学藏民语言。”在甘孜，曾为红军担任过“通司”的民众难以数计，其中有不少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红 30 军进占炉霍县攻打寿灵寺时，为争取寺内僧人不抵抗红军，两位从丹巴带来的“通司”毅然进入寺内，劝说寿灵寺与红军合作^[34]，遭到杀害。红 2 军团途经巴塘县，与仁波喇嘛寺发生武装冲突，喇嘛拉波为红军对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所感动，用藏文给仁波寺写了一封信，陈说利害，终于使仁波寺同意与红军合作。不仅如此，拉波还积极主动地为红军当“通司”，把红军带到甘孜县。到甘孜县后，拉波告别红军回巴塘，不幸在理塘途中被害。红四方面军刚到新龙县时，断腿藏民布阿，懂汉语，红军战士轮流背着他上山向躲藏的群众喊话宣传，使群众消除了对红军的恐惧，并支持红军。

2. 做向导，带领红军北上

由于甘孜藏区地形复杂、气候多变，红军每遇行军作战，几乎都要靠当地各族民众提供向导帮助。

红四方面军进入丹巴县，当地民众不仅要做好翻译和向导，还要协助红军战斗，甚至还经常深入老百姓中间做思想工作。康定县金汤角坝村民王永培等人，为红 4 军部队带路到金汤，先后当向导 28 天才回家；鱼通瓜达沟贫苦农民袁海清，积极为红军带路，侦查敌情，活动在麦崩到岚安一带地区，后遭到国民党迫害^[35]。在道孚县，据不完全统计，给红军做长期向导的就达 50 人。其中有城关乡的络绒次勒，麻孜乡的单戈大吉，瓦日乡的亚马俄布，孔色乡的冲翁勒等 28 人。回乡途中，有 15 人被当地反动武装杀害。亚卓乡有马占云等 19 人为红军北上带路，后全部遭到封建农奴主惨杀。红 4 方面军离开炉霍县时，扎日活佛派了芝里·甲巴仁青、青尼格两个亲信喇嘛给红军带路。炉霍还有 13 个人为红军带路离开了炉霍，有的牺牲，有的参加了红军。

红6军团离开乡城县时，桑披寺派出寺庙的大通司为红军带路去稻城、理塘，还有头人冷龙达洼家的娃子邓珠、洛绒达吉、日宫村坝根等人也给红军带路去了理塘。稻城县茹布乡的扒洛巴登给红军带路去理塘，还有傍河汤思阿友等人也为红军带过路。在理塘县，有旺堆等7人为红军带过路。在白玉县，嘎拖寺派出喇嘛莫扎生批等人把红军一直送到甘孜。

（三）踊跃参加红军，壮大革命力量

红军长征到甘孜时，由于长期处于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包围中，兵力损失较大。红2方军从湖南桑植出发时，全军团为9908人，到甘孜前，因种种原因，减员总数为6866人。^[36]红4方面军到达康北后，部队已由8万余人锐减到4万，损兵折将近半^[37]。因此，“扩红”工作是红军地方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红军在甘孜藏区到处张贴了“番、汉人民是一家”“参加红军十大好处”“欢迎工农与番人加入红军！”^[38]等标语。红军的“扩红”工作，得到了各族人民的踊跃响应。

在丹巴县，参加红军的人数最多，仅巴底乡就有271人参加红军^[39]。红军离开丹巴北上时，以马骏为师长的丹巴独立师约两千余人，随红军北上。在康定县的金汤和鱼通，先后有贺先德、撒满歇尔等18人参加红军，其中贺先德参加红军后，随军到达陕北，解放后曾任广州市文化局党组副书记。道孚、炉霍、甘孜县一带有2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其中道孚县的仁青多吉（汉名王寿才）在解放后担任过甘孜州副州长，炉霍县的赤绒恩召解放后也在青海担任了领导工作，以扎西旺徐为首的波巴政府骑兵队，在红军北上时，大部分被编入许世友司令的骑兵团，全国解放后，扎西旺徐先后在青海省、全国人大担任重要职务。在泸定（参加红军14人）、新龙、雅江、乡城、巴塘、理塘、白玉等地也有群众参加红军。

红军在甘孜藏区的“扩红”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人数虽不多，但是壮大了革命力量，意义十分重大。他们是“藏族革命的先驱者”^[40]，点燃了藏族地区革命的火种和希望。

（四）配合红军作战，保卫藏区红色政权

为了保卫藏区红色政权，甘孜藏区民众组成自己的革命武装，如番民骑兵队、格勒得沙革命军、波巴自卫军等^[41]，其主要任务就是侦察敌情，配合红军作战。

1935年10月底，红四军南出天全时，康定县守敌李抱冰得知鱼通、麦崩一带红军兵力薄弱，指使康定县第七区团总甲安仁等于11月16日率领民团二百余人偷袭麦崩，企图拖住红四军的后腿。鱼通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将光明率领工作人员与当地游击队员占据有利地形，以少拒众，坚守阵地七天七夜，直至22日，红35团10营及金汤苏维埃游击队赶来增援，共同击溃甲安仁民团，狠狠打击了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才保住了红四军后方机关的安全。

丹巴独立师在大金省军区领导下，开展了保卫金川赤区的武装活动。1935年11月间，丹巴独立团（即后来的独立师）一个连，到接近康定敌占区的白玉一带筹粮，以解决红5军团的供给困难。康定县第八区团总李海廷率民团袭扰，被独立团打得仓惶溃逃。1936年2月下旬，红4方面军翻越丹巴党岭雪山向道孚前进时，独立师1团配合红军在东谷沟、牦牛沟等地重创了国民党李抱冰部敌军，保证了红军西进计划实施。^[42]独立师2团在守卫大桑的战斗中，英勇顽强，迫使丹东土司所率近千名土兵仓惶败逃。

红军主力西进康北后，波巴自卫军除为红军筹粮外，还站岗警卫，维持社会秩序。据扎喜旺徐回忆，波巴自卫军甘孜骑兵大队常常痛击国民党骚扰，并深入到青海藏区为红军侦察敌情^[43]。他们在配合红军打击敌人的进犯、保卫红色政权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五）照料和保护红军伤病员，保存革命火种

红军长征到甘孜时，条件差，生活艰辛，又经常遇到国民党守军和地方民团的围追袭击，加之医药严重缺乏，导致伤、病员增多。因而在红军转移后对行动确实困难，无法继续随军前进的伤病员，急需就地妥善安置就显得十分迫切而重要。各地波巴政府决定发动群众来照料和保护红军伤病员。

红4方面军进入康北初期，伤、病员的日常护理及砍柴、背水、运粮，煮饭以及换药，洗衣服等工作，都由格勒得沙政府动员当地群众担任。当红军北上时，丹巴县群众便将没有转移走的伤病员安置下来，为他们继续治疗，甚至用生命保护他们免受敌人的迫害。^[44]康定县保护安置红军伤病员及红军尾队流散人员40多人（女红军6人），孔玉、角坝、河坝等地，红军行军、停留先后达40多天，大部队走过后留下了二十多个红军伤病员，角坝苏维埃政府主席王兰廷、委员沙达等将伤病员分散隐蔽组织群众安置保护起来。红军撤离县境后，国民党派人“清乡”四处搜查，吊打苏维埃政府主席鼓逼交出隐藏的红军伤病员，他们忍受百般折磨也不愿暴露，保证了红军伤病员的安全。

红2、4方面军会师北上后，留在当地的伤病员，主要集中在炉霍、甘孜、道孚三县，总数为3800余人，其中留炉红军最多，达1100余人。藏民把红军当作自己的亲人，细心护理，想方设法保护红军安全。红军刘姓伤病员被收留在炉霍县棒达村一个藏民家里，后被国民党军队发现抓走，棒达村全体村民组织了20多支枪包围了国民党军队的营房，逼其交出。经过多次交涉，由全村群众凑集320个藏洋，赎回了刘姓伤员^[45]。在藏民的精心护理和保护下，红军伤病员没有损失一个。

在甘孜县，群众救护或转移留下来的大多数红军伤病员。仅格达活佛就收留了205名红军伤病员，冒着生命危险秘密组织群众分散隐蔽轻伤员。他亲自用藏医藏药对伤病员进行治疗。一些红军病愈后，愿意回内地，他指派自己最信任和最得力的随从般根、色波，将红军送到道孚，并安全转送到康定。为了保证红军伤病员的安全，桑根寺活佛桑根顿珠要求手下将受伤红军接到桑根寺一带居住，并设法躲开了国民党军队的搜捕和屠杀^[46]。甘孜的喇嘛寺也收留安置了一些红军伤病员。仅东谷喇嘛寺就收养红军伤病员17名。

新龙县益西寺为救护红军尽到了最大责任。1936年2月，红军的一支纵队在翻越海拔4974米的雪山时被强烈的阳光反射之后，得了雪盲症。益西寺立即派去十几个僧人将患了雪盲的战士接送回寺庙，把他们安置到温暖的扎寨内，熬了酥油汤，并用一些当地草药为患者治病^[47]。不久，大部分红军要离开益西寺了，留下四位受伤严重、身体虚弱的红军战士。僧人们担心国民党追杀他们，就把他们隐藏在磨房里。两个多月后，红军战士的身体稍稍恢复后，就要求去甘孜县。为安全起见，僧人们拿来四套藏装，把酥油和糌粑摸在战士的脸上，装扮成了藏族民众，把他们安全送到了甘孜县，并且得到了朱德总司令的热情款待。

^[48]

在道孚县，根却志玛负责照料十名红军女伤病员。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她把女红军分散隐藏于深山老林和地窖内，并治好了伤，帮助她们在当地安了家。反动派曾为这些事情责骂她，用皮鞭租枪托打她，但她从不屈服。^[49]

甘孜各地民众悉心照料和保护红军伤病员，保存革命火种的无数动人事迹，深深地感动了红军战士，使藏汉民族之间结下了牢固的民族情谊，奏出了汉藏团结、各民族团结的伟大颂歌。

红军的民族政策和模范行为对甘孜藏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赢得了各族人民的尊重和拥护。藏区人民在地方自治政府的精心组织下，尽其所能给红军以最大的支持，保证了红军的顺利北上，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斯诺. 西行漫记 [M].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158.

[2][5][6][9][22][31][45][49] 温贤美. 藏族人民支援红军长征 [J]. 西藏研究, 1982, (2).

-
- [3][11][13][14][25][27][33][37] 于安龙. 藏区在红军长征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作用 [J].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15, (5).
- [4] 江觉梅朵. 红军和各族人民心连心 [J].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75, (3).
- [7] 朱成源. 长征在雪山草地 [M].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6. 216.
- [8]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 [M].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10.
- [10] 任乃强. 康藏史地大纲 [A]. 任乃强藏学文集 (中册) [C].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9. 543.
- [12] 金炳镐, 王铁志. 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通论 [M]. 黑龙江民族出版社, 2002. 173.
- [15] 追寻红军足迹: 探访“康巴第一寺”——桑披岭寺 [EB/OL].
http://sc.wenming.cn/zbsc/201506/t20150611_2671223.htm.
- [16] 喜饶尼玛. 炉霍藏族人民对红军长征的贡献 [J]. 中国西藏, 2016, (5).
- [17][24] 龚自德. 康北波巴政府的建立及其对红军的巨大支援 [J]. 川北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5, (3).
- [18][28][34] 中共甘孜州委党史研究室. 红军长征在藏区 [M].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3. 2-3, 230, 226.
- [19] 赤匪蹂躏下的泸定 [J]. 康藏前锋, 1934, (9).
- [20] 刘文辉. 新西康建设十讲 [J]. 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 (下册). 533.
- [21][39]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写组. 红军长征在四川 [M].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437, 437.
- [23][38][41][42][43][46] 干旭, 郎维伟. 红军长征过藏区及藏族人民对红军的支援和贡献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06, (11).
- [26] 康定民族师专编写组. 甘孜藏族自治州民族志 [Z].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295.
- [29] 肖华. 忆红军长征在少数民族地区 [J]. 中国民族, 1983, (8).
- [30][44] 古卿. 丹巴红色文化资源调查 [J]. 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 (3).
- [32] 谭尚维. 甘孜会师 [N]. 解放军报, 1975-10-18.
- [35] 四川省甘孜军分区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 甘孜藏族自治州军事志 [M]. 1999年5月第一版 (内部资料性图书). 144.
- [36] 关向应. 二、六军团长征政治工作总结报告 [A] (1936年12月19日). 本书编辑组编.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C]. 中

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350—357.

[40] 徐学初，刘君. 试述民族团结在红军长征胜利中的重要作用——以四川藏区的红军故事为例 [J]. 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2）.

[47][48] 生根活佛. 益西寺救助红军的故事 [EB/O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7260b501009704.html, 2008-04-21.